中国近代企业财务制度变迁探析

兰日旭, 林雨祺

(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财务制度是企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制度性因素之一,合理先进的财务制度有利于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管理企业、获得更多经济效益。通过对传统企业、近代不同类型企业财务制度的资金管理、成本管理、利润管理的系统梳理,尤其是围绕大生企业集团的财务制度的变迁,可以发现在近代中国企业财务制度变迁中,20世纪20年代前后存在一个明显的阶段性分化,虽然在财务制度的内涵上传统会计报表因素的影响依然浓厚,但向现代转型的趋势明显,出现了记账方式倾向于现代化、账务内容更具概括性、日益重视成本核算管理等趋势。近代企业财务制度虽然多元,但由于受企业内部需求、西方复式簿记等因素影响,不同企业的财务内容不断简化、财务制度逐渐统一。

关键词:近代企业;财务制度;资金管理;成本管理;利润管理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20)05-0040-1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0.05.004

财务制度是企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重视。然而,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基本侧重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财务制度,对于近代中国企业财务制度的部分则极少论及,即使有所涉足也是在经济史、企业史、会计史等整体论述中提及或者在企业会计报表中论述,缺乏系统分析的文章。本文在系统梳理近代不同类型企业会计报表基础上,分析它们的财务制度内涵变迁,特别是围绕大生企业集团的财务制度内涵变化,揭开近代中国企业财务制度变迁的特征及其趋势,为当前企业财务制度的改进提供借鉴。

企业财务制度内涵广泛,存在一定的争论。近代中国《公司律》或《公司法》中虽有企业账务的规定,但尚未提及财务制度。为此,

本文论及的企业财务制度,仅指以企业(不包括行政事业)会计报表为表现形式的内部财务收支活动的规则和制度,主要包括企业资金管理、成本管理和利润管理等方面的内涵。下面就以此为基础,展开深入系统的分析。

一、近代企业财务制度演进

近代中国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中,企业类型多样,不同企业之间的会计报表形式、内容差异极大,而不同类型企业会计报表内涵所反映出的财务制度,明显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

(一)中国传统企业财务制度

在近代时期,无论是企业的数量或资本规

收稿日期:2019-10-28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工厂制度与劳资关系研究”(14AZD108)

作者简介:兰日旭,男,福建武平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雨祺,女,安徽合肥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

模,独资企业和合伙制企业都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自1872年股份制企业出现以来,它们的影响力仍然强大。据统计,在1933年,私营工业资本组织形式中,这两种组织形式占到工业企业总数的66%^[1]。在近代民间的企业中,传统金融机构钱庄基本属于独资,票号则以合伙制为主,票庄经办业务繁忙、分支机构数量多、影响力强,在企业发展中已经萌生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某些雏形,其财务制度在传统企业中也较为完备,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而作为老北京“八大祥”之首——瑞蚨祥,则因其账簿的完备,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传统商业企业的财务制度内涵。这些传统财务制度与近代不同类型企业财务制度的比较,参见表1。

从表1中前面三类传统企业来看,银钱业和商业的财务制度因为业务经营领域的侧重点不同,进而演化出不同的财务制度。然而,银钱业、商业企业的财务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传统财务制度为主。在会计记录上,因为保密需要,不同地区钱庄账簿名称、记账科目各异,未形成统一的财务制度,并且钱庄、票号在资金管理中过于关注资金的往来状况,账簿设置繁多,容易导致记账重复。相同点在于银钱业和商业都没有规定固定的会计科目。这

样的账目外人难以理解,很少将性质相似的账目进行整合。在成本管理上,虽然设置了单独的账簿进行成本记录,但是票庄成本管理较为僵化,商业的成本管理也未关注进货总数、存货总数等对于企业经营管理具有重要价值的的数据。由于对于成本的核算不够重视,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利润管理上,相同的是,它们大都编制红账和年度总结进行管理,每年或三年分配一次利润,大部分利润都在财东和顶身股持有者之间分配,提取公积的金额很少,导致资本积累不多,在遇到危机时极易陷入经营困境。利润除了用于公积、分红外,其他用途较少,并不用于投资其他企业。此外,利润的金额还有很大操纵空间,可以将利润藏在存货、现金中,有意隐藏利润。在红利分割时,出资人和掌柜在基本利润分配原则下,还会出现明让暗争、私藏挪用利润的情况。

从表1以及传统银钱业、商业财务制度的史料中,我们发现在票号、钱庄等会计报表中的企业财务制度已经出现了一些与现代财务制度相似的特征。例如在利润管理上,在进行红账编写时,使用了轧龙门的平衡原理,与西方现代财务制度中的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原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钱庄经理、票号掌柜通过红账、年度总结制度向所有者报告经营情况,

表1 传统财务制度与近代企业财务制度的比较^①

企业类型	典型特征		资金管理			成本管理		利润管理		
			复式记账法	对应付账款、应收账款分类合理	记账科目具有整合性	存货管理体系较为完善	重视成本核算	有月度/年度总结	利润分配用途多	利润金额受人为影响小
钱庄	福康钱庄、福源钱庄		×	×	×	无	×	√	×	×
票号	祁帮、平帮、太帮		√	√	×	无	×	√	×	√
批零商业	瑞蚨祥		×	√	×	×	×	×	×	×
无限公司/合资公司/股份公司	茂新、福新、申新公司	1921年前	×		×	×	×	√	√	
		1921年后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	鸿生火柴公司等刘鸿生所办企业	1929年前	×	×	×	×	√	√	√	√
		1932年后	√	√	√	√	√	√	√	√
两合公司	聚兴诚银行	1919年前	√	×	×	无	无	√	×	×
股份两合公司		1920年后	√	√	√	无	√	√	√	×
外国公司	英美烟公司		√	√	√	√	√	√	√	√

与现代股份制公司发布年度报告类似。

(二)中国近代九种企业的财务制度内涵

在 1904 年晚清政府颁布《公司律》以及 1914 年《公司条例》、1929 年出台的《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后,在公司法的定义上先后出现了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有限公司、外国公司九种公司类型。这九种类型的公司不是同时存在的,而是随着企业的组织形式不断发展和公司法的修订而出现的。究其实质,这九种公司又可以分为无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公司、外国公司五类^[2]。根据上述公司法规中账务部分的规定,以九种类型企业的会计报表为基础,梳理出代表不同类型企业的财务制度内涵以及相互的异同点比较,参见表 1 后五行。

通过表 1 后五行,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以会计报表为内核的企业财务制度演进日益趋向近代化。

一是受西方影响,财务管理中记账方法逐渐现代化。近代不同类型的企业在资金管理上虽然依旧保留着传统财务制度的痕迹,比如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的资金管理中依然保留了与传统财务制度相似的管理过程,管理日常经营的往来支出时,先记入流水账再登入总账进行总结等。但是更多的企业,比如聚兴诚银行、刘鸿记账房已经发现传统单式记账方法不能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数字容易出现错漏、科目名称内涵不清,这些缺点导致账目不清、无法如实反映企业资产状况、导致企业经营管理困难。为了弥补传统财务制度的不足,出现了完全采取西式财务管理方法或采用改良中式财务管理方法两种趋向。以统一管理刘鸿生企业集团的刘鸿记账房为例,刘鸿记账房的管理人员在了解西方的资产负债表之后,认为西式财务制度中资产负债表更为清晰,不同于旧式财务制度,于是聘请留美会计师林兆棠对

财务制度进行了改革。1932 年之后刘鸿记账房采取现代财务制度中常用的记账方式——复式记账法,并进行资产负债表的编写,1940 年代开始编写试算表、决算表。新复式簿记可以将日常经营中的分散数据整合成集中的系统信息,数据更加清晰,能够更好地为企业的经济活动服务^[3]。我们将 1929 年刘鸿记账房总账与 1932 年的损益表进行对比,如表 2。

从表 2 中清晰对比出,复式簿记中的会计科目更加科学、更具总结性。例如,收入项下分有股份收入、薪水报酬、利息收入、杂项收入等。后期刘鸿生创办的中华煤球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更出现了固定资产、递延资产、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等会计科目,同时将每项支出和收入占总支出/收入的百分比单列,这样可以清晰地看出某项支出或收入的重要程度,为合理安排以后的开支或收入提供参考。而且,损益表从单向记录变为左右对照的格式进行记账,使得收支对比更加明了。

二是开始重视成本核算。钱庄、票号的财务制度在成本的核算上不很明确,不利于企业了解日常经营的成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许多企业开始重视成本核算。茂新、申新公司在总公司成立之后就推行成本核算;刘鸿记账房也非常重视成本核算,刘鸿生认为“只有降低成本,才能提高竞争能力,增加企业利润”^[4],为此,还专门聘请专家针对其运营特点设计了成本管理制度。以苏州苏纶纺织厂为例,在采用改良会计簿记的阶段,为了解决成本核算问题,添置了四本日记账——“棉纱日记”“棉花日记”“棉布日记”“物料日记”,几种誊清账“原料”“物料水脚”等来对棉纱、棉布的成本进行初步核算,相较于之前大包大揽的传统成本管理有很大的进步。后期苏纶厂拓展业务范围,生产多种产品,改良中式簿记不能适应对多种产品同时进行成本核算,所以 1946 年苏纶厂重新设计财务制度,最终采用了西式复式簿记方法^{[5]526-528}。这些重视

成本核算的企业通过对成本进行记录,从而对企业的生产成本、经营成本、存货等情况有了清晰的了解,有助于企业运营管理、避免存货积压。

三是在利润的分配上,近代企业受到西方公司的影响,利润分配的方式更加科学合理。传统钱庄、票号大多提取公积较少,将企业绝大部分利润分配给东家及掌柜等经营管理层,资本积累少。但近代企业除了把盈利分配给股东之外,更多地把利润投入到资本积累,扩大企业规模,投资其他企业等方面。利润的使用更加多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企业的收入来源,加强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相对于传统的资金管理方式,近代九种企业在资金管理上更具综合性。不似票庄将管理重点放在资金流动上,在资金管理上,近代

企业增加了对于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综合管理,将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和企业日常资金放在一起进行管理。

二、大生集团的财务制度变迁

在近代三十多家大型企业集团中,大生集团成立较早,财务制度明显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以它的会计账簿为中心分析财务制度内涵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大生集团由多家企业组成,企业财务报表的史料记载数量多且内容较为详尽,大生集团的财务制度演进过程基本能够诠释和反映近代中国企业财务制度的变迁特点。

张謇在1895年开始筹备通州大生纱厂的时候,资金筹备过程困难重重。虽然他有科举状元的头衔以及满腔的爱国热情,自认“介官

表2 1929年刘鸿记账房总账与1932年刘鸿记账房损益表对比^②

1929年刘鸿记账房总账 单位:两		1932年刘鸿记账房损益表 单位:两					
		损		益			
		项目	银元	百分率	项目	银元	百分率
官红利:413017.77		有价证券损失	130587.54	9.551	各项股份收入	388839.51	30.821
自手(薪水佣金等):15377.96		公事房开支	7387.35	0.540	薪水报酬	46498.40	3.686
四川路及亚德路房租23972.34		兑换损失	31579.18	2.310	公司股票损益	13711.04	1.087
鸿福里房租:3069.43		利息支出	687411.99	50.277	产业收入	190233.99	15.079
日晖港房租:1542.5		产业费用	39401.15	2.882	开滦收入	257245.77	20.390
下关地租:4294.06		交际	7274.40	0.532	东京煤收入	29621.13	2.348
车袋角地租:251.47		公益善举	21717.01	1.588	利息收入	293008.31	23.225
共收:461525.53		会费	1073.50	0.079	杂项收入	42451.52	3.365
家用:1253.01		赠与	211200.00	15.447		1261609.67	100.00
公子雅用:2811.88		津贴酬劳	10470.64	0.766	收支总账结亏	105639.37	
捐款:63114.43		留学费用	68182.05	4.987			
贴薪:1992.49		教育费用	2647.79	0.194			
交际费:4242.43		家用	54908.88	4.016			
书籍学费:5625.25		本人零用	1197.57	0.088			
汽车用费:2420.58		意外损失	60766.94	4.444			
医药费:3424.78		本人提取	7259.09	0.531			
护街费:2178.58		杂项支出	24183.96	1.769			
俱乐部用费:888.57							
清浦苗圃:1645.70							
运动器具:47.89							
叶夫人:8604							
定海女中学:4739.65							
留学费:37497.89							
杂用:3847.74							
利息:60389.69							
共付:204724.56							
结余:256800.97							
			1367249.04	100.00		1367249.42	

商之间,兼官商之任”^[6],然而却不是官员或商人,在招股的路上四处碰壁,陷入了筹办危机。经过艰难筹办,大生纱厂终于在 1899 年 3 月完成设备安装等前期准备工作,于同年 5 月正式开车纺纱。然而当时纱厂流动资本有限,无奈之下采取了“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的方针,当年纱价上涨,纱厂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利润丰厚,投资者纷纷增加投资,纱厂终于走出了困境,开始正常运营。1901 年到 1913 年期间,纯利润共有 355.2 万两规元,大生纱厂不仅成为大生资本企业集团的第一家企业,更是大生集团的支柱性企业^[7]¹⁵⁴。

在大生纱厂取得成功之后,积累的丰厚利润使张謇能够通过开设更多企业以扩大其原料基地,降低生产成本。到 1921 年,大生企业集团已经拥有超过 40 家企业,涉及纺织、农垦、航运、机械、金融、教育、食品加工等众多行业,控制的资金总额总计两千四百八十余万两,大生集团各纺织厂拥有纱锭 16 万枚,布机一千三百余台,成为快速崛起的民间资本股份制企业集团之一^[8]。

从大生集团的成长壮大来看,其财务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向近代转换的过程。初期的财务制度留有很浓的传统色彩,这点从大生纱厂的账略之中可以窥见,张謇还是用较为传统的财务制度对企业进行管理。在大生纱厂拥有两张报表中,收支账负责说明在一年中因为进花出纱、分发官利、支出薪水等而发生的资金往来变动情况,表中的数字为流量概念。盘查实在的报表负责说明股本数量、存货、官机成本情况,即存量概念。上方记录“存”如官机股本、商集股本、钱庄往来,最后加总统计共存规元数,构成比较类似于现代记账中资产负债表里负债里的股东权益、流动负债部分。下面记录“在”部分,主要是记录企业拥有的资产数,对短期资产、长期资产进行管理。表格最后计算共在数额,构成类似于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部分,上下相等,体现了平衡的

思想。

在资金管理方面,在收支账上进行记录资金变动情况,收支账还是采用的中国传统单式记账法,采取上收下支的传统结构。其中会计科目名称由日常业务确定,比如支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商款官利,收售棉子款飞花各花余、保险费等,以此进行日常流动资金管理,了解企业经营情况^[9]⁵。

在成本管理方面,大生纱厂使用进花出纱核余这一会计科目来表示经营纺织业的收入和成本。出纱代表企业的销售收入,进花则为用于纺织的原料成本。对于购入花的总数、价格等详细情况在账略中并没有提及,但在日常的经营中进花出纱是纱厂运营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在《大生纱厂章程》中规定“每逢收花之时,应将每日所收子花、净花各斤数,合价银洋各数,填单送总账房核备”“纱庄售出之纱,每日应将收进、售出之总数各若干,收价洋若干,照填各单送总帐房,收数注帐”^[10]。对于销售产生的保险费、花纱厘捐税等其他成本,大生纱厂又列为单独的支出,在账略中进行记载。对于生产所剩的半成品以及未销售的产成品,大生纱厂在正式开车之后在盘查实在下方的“在”部分记录这些存货的价值,对存货还进行存花、现存物料等分类管理。成本管理更加全面、细致。

在利润管理方面,利润通过收支差额表现出来,在收支表的下方,共存和共支的差额为本期结余,再减去提取公积、花红等即为本期可分配余利。若本期盈利,则盈利记在盘存实在表上方“存”部分,以余利、官商股份余利等形式表现出来;若本期亏损,则记在盘存实在表下方“在”部分^[9]¹¹⁴⁻¹¹⁶,以本届结亏科目呈现。大生纱厂的利润主要是用来支付红利、进行投资实业、油厂、面厂、学校等。余利、官利、投资数额明细在盘存实在表中均有报告。并且在文件层面,《大生纱厂重订集股章程》、通州大生纱厂第二届述略中都对折旧、提取公积,向

股东分配余利进行规定和补充说明。早期大生纱厂的财务制度内涵体现出典型的传统特征,资金管理上记账科目零散化,成本管理上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利润的用途较为单一。

随着大生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受民国以来像谢霖等留洋专家向国内传播先进财务管理思想等影响,大生集团财务制度自身也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

第一,整体会计科目名称更具概括性。大生纱厂为了扩大资本规模和积累、开设新厂、支撑其他配套工厂的发展、不断地发行新股,使得官机股本和商集股本以及相应的官利余利都发生改变。面对这种改变,为了分辨不同时期发行的股本,盘查实在表一开始将股本分为官机旧股本、官机新股本、商集旧股本、商集新股本等进行分类如实记录。这种管理方式虽然让股东能够清晰了解不同时期官利、余利的支付情况。但缺点在于多次发新股之后,两张会计报表中需要在收支、“存”部分各报告一次支付情况。这导致会计科目过于繁杂冗长,本质上相同的条目重复出现。随着后期股票的不断发行,在账略后面还附加了详细的新股和旧股的数量以及余利分配计算情况。1914年大生纱厂第十六届账略中盘查实在就已经出现了超过20条关于不同届新旧股正息、余利的内容。后来为了简化盘查中的会计科目,第十九届账略开始逐渐将这些相似的会计科目进行合并,1918年大生纱厂编制了逐年股本锭数盈亏表,详细列出了逐年的股本、锭数、盈亏情况。在1919年大生纺织公司第二十一届账略上就将这些繁杂的内容合并并调整顺序,只区分上届或本届,余利或正息等。这样大大减少了相似重复的会计科目的出现次数,更具有概括性和条理性^{[9]192-136}。除了股本相关的科目越来越具有概括性之外,报表中其他的会计科目也较为固定和明晰,例如息金、煤斤物料等都在大生纱厂、分厂等企业集团的财务报表中长期出现,保持了财务报表会计科目的一致

性,相比于钱庄等传统企业的报表会计科目繁多、地区差异较大,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完善。

第二,资金管理上对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处理更加合理。传统的钱庄和票号大多以资金作为记账的主体,前文提到在处理应付账款和应收账款时,将应付账款认为是别人的资金暂时寄存在“我”这里,应当在财务报表中报告为资金增加,将应收账款认为是资金在外,而在表中记录为资金减少^{[5]217}。但是从现代角度来分析,像信用款、行庄往来、暂时存款在未来的应付账款是要进行偿还的,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负债,应当记录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一栏。大生企业集团在编制盘查实在表的时候就将存入款、暂记存款、各种抵押款记入“存”一栏,也就是负债一栏,符合现代的记账规则。把各项垫款、暂记欠款、催收各款等记在“在”一栏,类似现代的资产一栏^{[9]151-153}。这样记账能够使大生集团更好地掌握企业现在的资产、负债等情况,而不会像以资金为主体的记账方式一样高估自己的资金收入,高估企业实际拥有的资产,从而更有利于大生集团的长期经营。

第三,利润管理上,实行高利润高分配,资金在企业集团内调拨。张謇在大生纱厂获利之后,仅在1899年至1911年之间,又在南通创办和投资了27家企业,这些企业的投资资金,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大生纱厂的公积。张謇本人说“謇之营通州各公司也,周转之资,诚以大生厂公积款为母”^{[7]135}。从大生纱厂的盘查实在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913年大生纱厂的总资产三百三十三万余两中,实业公司的资产为纺织新厂机器,纺织学校的建筑调拨的资金就超过40万两,占到总资产的12%,占固定资产总额837 711两的47%^{[9]87-90};到1922年,对于集团其他公司的资金调拨总额达到了四百七十三万余两,占到总资产的38%,比例进一步上升^{[7]136}。多样化的投资不仅扩大了企业规模,而且在大生纱厂自身效益较低时,其他行

业如垦牧公司的利润能够有力支撑大生集团的生存和发展。综合使用企业营业利润不仅是因为张謇的个人理想,也是为了企业更好地发展,体现了近代企业财务制度中利润分配用途多的特征。

虽然这样的资金调拨在近代其他的企业集团中十分常见,但是张謇的企业集团还是股份有限公司,是“借各股东资本之力”来完成他的目标,怎样才能使股东与张謇本人的意见一致呢?张謇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采取对企业利润进行高利润高分配的方法,以此来保持股东对大生纱厂的信任和支持。从大生纱厂的报表中,我们可以发现,截至1921年,大生纱厂一厂、二厂的总盈利达到1663万两,其中有1348万两以官利、余利、花红形式分配给各股东,大生一厂、二厂自身提取的公积金额都很低,合计总公积仅有一百二十万余两^[11]。

这样的利润管理方法使得股东能及时获得股利,且当时大多数股东都存在一种心理,即只在乎获得股利,对企业的经营情况不甚关心。所以股东在获得余利、官利之后,再加上对张謇的信任,能够一直支持大生纱厂。相对于传统银钱业借口提高公积,最后达到挪用利润目的的做法,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这种分配方法能够延续下去的前提是大生纱厂能够每年不断产生充足的利润,一旦大生纱厂的利润下降,无法维持这种循环,大生整个集团就会遭遇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三、近代企业财务制度演变阶段及原因

从中国近代财务制度的演变过程来看,近代中国企业财务制度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存在明显的差异。20世纪20年代之前,不管是在企业财务制度内涵还是制度上都处在以传统向现代过渡为主的改进阶段,之后则是财务变迁成果制度化阶段。

一是20世纪20年代之前为企业财务制度

的改进阶段。1872年轮船招商局产生之前,传统企业财务制度的内部构成上萌生了某些现代财务制度的内涵。之后,伴随中国股份制企业的产生,在西方企业在华经营活动及其借贷复式簿记的影响下,中国加快了改进传统财务制度的进程。这一时期,政府法律规范极其有限,强制性规定较少。1914年尽管颁布了《会计法》,但内容上并没有涉及到企业会计规范,财务制度内涵的变化更多是企业内部自发地谋求改变。虽然不同类型的企业转变的具体时间不同,但在前文的分析中发现,各企业主要在1920年前后开始在财务制度上发生了重大变迁。荣家集团在1921年总公司成立后采用新旧账簿并存的财务制度;大生集团在1919年开始进行整合记账科目等一系列改良;聚兴诚银行从1919年接触了西方资产负债表之后开始漫长的财务制度变迁。这些企业在财务制度变革之后,焕发了新的活力,提高了经济效益。

二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至1949年期间为财务变迁成果制度化的阶段。这一阶段,国民政府在法律层面上将企业财务制度变迁成果固定下来。1935年国民政府在修订1914年《会计法》的基础上重新颁布了《会计法》,此时已经完全吸纳了前一时期企业财务制度内部改进的内涵,涵盖了记账方法、会计报告的编制、会计科目等与财务制度相关的内容。其中很多规定对一般企业同样适用,进一步促进了近代财务制度的统一化。1943年国民政府主计处发布一系列关于统一会计科目的规定,使得各行业企业的财务报表组成要素更加统一,增加了企业财务报表之间的可比性,推动了近代企业财务制度向现代财务制度变迁。

前期并没有国家法律等对于企业财务制度进行外力直接强制性干扰,仅是不同时期政府发布公司法,对公司的性质、股东的义务和权利等进行界定。企业财务制度变革的实践先行,政府规范财务制度随后跟进。

20世纪20年代前后发生的企业财务制度内涵及其制度性变化,推动了传统财务制度向现代财务制度方向发展,主要由以下三个因素引导。

首先,企业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是引发财务制度向现代转换的根本因素。企业成立、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于利润的追求,企业家必然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本企业的财务管理能力。钱庄和票号的管理核心就是资金,所以建立了以资金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体制,但是制造类的民营企业为了长期盈利,必然要了解、控制生产成本,对财务制度有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中式财务管理对于成本控制往往大包大揽,对成本进行严格的控制和预算,如票号根据业务流程,对分号进行统一控制和标准费用预算,制定详细的费用支出规则来解决信息不实、挤占成本等问题。但是这种管理方式极其复杂,不能适应制造企业面临浮动的市场价格等现状。公积较少的利润管理方式不利于企业进行积累扩张,在遇到风险时企业难以维系。

所以,管理科学、全面细致、抗风险能力强的现代财务制度成为了企业的演进目标。在资金管理上,现代财务制度使企业家对企业内资金的流入流出、资产状况更加熟悉,不易出现错漏。成本管理上使用恰当的成本核算方法,使企业能够根据市场状况控制生产成本。在企业利润管理方面,在提高公积的同时将企业利润合理分配到不同方面,分散企业的营业风险,避免出现企业资本积累不足的现象,提高企业抗风险的能力。荣家企业通过增加企业的公积,不断开设新厂,扩大生产规模和产品种类,大获成功。正如申总会计部门职员容得其指出的,“申新除发股息之外,一般不发红利给股东,盈利不断滚下去,用来扩大再生产;如像烧肉,老汁永远不倒出来。别的厂就不同,红利都分掉,所以碰到困难,就站不住脚了”^[12]。

其次,当时的社会环境为财务制度的变迁创造了条件。1840年五口通商后外商企业开

始在中国展开经营活动,逐渐将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形式以及新的财务管理方法传入中国,为近代企业财务制度变迁提供效仿对象。1862年成立的旗昌轮船公司虽然不属于真正的股份公司,但是却带来了不少制度上的创新。比如在成本管理上使用成本核算方法,重视降低支出,提高利润。在利润管理方面利用企业盈利进行再投资,不断扩张企业规模。这些财务管理上的特征都与表1列出的近代企业财务制度特征相似。同时,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近代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出现,新的组织形式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方法提出新的要求。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想要企业正常运转并获得各股东的支持,至少要保证企业的利润足够每年的股息和红利的分配。出于经营考虑,各类型的企业,如大生集团逐渐转向科学、全面细致的现代财务制度。同时,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提倡国货运动促进了国内商业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初时,国内市场扩大,企业的整体数量增多、企业规模也有所扩大,企业传统的经营管理难以适应经营规模变大的现实,这更推动了企业进行财务制度内涵变化的实践。

最后,近代留洋专家作出了推广先进财务制度的努力。留洋归国专家谢霖、徐永祚、潘序伦等人出版专著、开办学校、培养专业人才,这些努力使近代财务制度变迁实践成为可能。1905年蔡锡勇编写的《连环账谱》出版,此书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研究借贷复式簿记的专著。他认为产业落后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和民间的账目管理缺乏科学性,杂乱无章。所以蔡锡勇学习西方簿记方法之后,回国后开始研究怎样将西方簿记的优点与中国传统簿记的优势结合起来。虽然书中设计的财务管理方法存在缺陷,没有得到实际运用,但是推动了近代财务管理的理论进步。后来谢霖引入会计师这一职业,并设立职业资格标准,开设会计师事务所,逐步开展人才培养。1928年,留美归

来的潘序伦设立立信会计学校,开始大规模培养专业财务人才。据《立信会计学校概况》统计,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毕业生也高达几万人^{[5]505}。毕业生拥有扎实的财务处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为当时正处在财务制度变迁阶段的近代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四、近代企业财务制度演变特点

从近代企业财务制度的构成和大生企业财务制度的前后变化来看,近代中国企业财务制度的变化存在如下一些特征。

一是财务制度形式多元化。从表 1 后五行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公司所采取的财务制度也有所区别,整体基本上传统与现代并存。第一种是最传统的财务制度,比如 1929 年前的刘鸿生集团公司,总公司成立前的福新、茂新、申新公司等,这些企业的财务制度还留有深深的传统烙印。如采用传统的中式单式记账法进行财务管理、重视资金的进出、账簿数目繁多等。第二种是改良或现代财务制度,这种财务制度在制造企业中较为流行,因为这种财务制度不仅能帮助企业了解资金的流入流出,增加了资产负债表后还可以清晰地了解企业现有的资产、产品生产成本等。对于制造企业来说,企业需要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才能更多地获得盈利。所以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企业财务制度改革的浪潮兴起,很多企业都开始采用西方现代的或者改良后的中式传统财务制度。但这些企业由于经营思想不同以及经营特点不同,在财务制度大体相同的基础上,不同企业的财务又略有区别,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二是财务制度的近代化演进趋势明显。从时间纬度看,中国近代企业的财务制度逐渐现代化。以苏州苏纶厂为例,这家工厂在不同的时间段实行的财务制度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第一阶段,苏纶厂是实行了中式传统的财务制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纶厂规模逐渐扩

大,中式记账法逐渐无法满足企业的管理需要,在成本管理上存在许多不足,于是苏纶厂改进自己财务管理制度,实行改良的中式财务制度,既结合传统的财务制度,易于接受,又能取西方现代财务管理的优势,取长补短。但是随着企业产品数量的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改良中式财务制度也逐渐无法满足企业成本管理的要求。于是在 1946 年,苏纶厂最终采取西方的财务制度经验,重新设计自己的财管制度,实现财务制度现代化。苏纶厂只是当时数以万计企业的一个缩影,从表 1 后五行关于近代企业财务制度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出财务制度的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不同企业的财务制度不断向先进财务制度靠近,特征逐渐一致。

三是财务制度的渐进变迁。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过程。这是社会中的非正规制约嵌入的结果^[13]。这些文化制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制度变迁路径的线索。受到中国几千年商业历史发展习俗的制约,近代企业财务制度变迁是渐进的。几千年商业传统财务制度对企业的发展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转变为现代体系的过程是渐进缓慢的。一些大型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完成了财务制度的转变,但中小企业因为经营规模小,财务制度转变的动力不足以及自身不具备先进的经营意识,很多还在沿用传统财务制度。此外,近代财务制度变迁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的特征,每一阶段都有赖于前一阶段的成果。如前文所述,1935 年重新颁布的会计法就充分吸收了前一阶段近代企业财务制度内涵转变的成果。虽然在财务管理上还存在传统因素的影响,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向现代财务制度演进的趋势。

五、结论

中国近代企业财务制度尽管传统与现代并存、衡量标准存在很大差异,难以形成一个相同类型企业相对统一的财务制度,但其总的趋

势是,以不同类型企业会计报表为基础的财务制度内容越来越趋向统一和简化,向现代不同性质、层次的财务制度趋近。近代企业财务制度变迁受到了多种因素影响,但其演进的路径则基本上是从企业内部需求出发,渐进推进的。由此,在近代中国九类企业共存的条件 下,财务制度也表现出多样化,各地之间的财务内涵明显存在较大不同,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经营、拓展的成本,在深层次上增加了传统向现代企业转型的困境。

注释:

- ① 资料来源:郭道扬编著:《中国会计史稿下》,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203-217、234-235、240-241、268-273、285-287页;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第614-616页;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北京瑞蚨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56、115页;金其桢,黄胜平:《大生集团 荣氏集团:中国近代两大民营企业集团比较研究》,北京:红旗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10-311、328页;郭霖:《刘鸿记账房研究1931—194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2010年;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 回忆我的父亲》,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65页;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重庆工商史料第6辑:聚兴诚银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1-13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81、1483页。注:因有限公司数量较少且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史料记载较少,故在表格中省略;表中的√表示符合,×表示不符合,无表示没有涉及到相关内容,空白则受资料限制难以确定。
- ② 资料来源:刘鸿记账房损益表(1932年1月1日

至12月21日),刘鸿记账房档案,卷号12-004、12-014,转引江满情:《中国近代股份有限公司形态的演变——刘鸿生企业组织发展史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4-96页。

参考文献:

- [1] 陈真,姚洛.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9.
- [2] 张忠民. 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300-301.
- [3] 江满情. 中国近代股份有限公司形态的演变:刘鸿生企业组织发展史研究[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4-97.
- [4] 刘念智. 实业家刘鸿生传略 回忆我的父亲[M].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66.
- [5] 郭道扬. 中国会计史稿:下[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 [6] 张謇. 张謇全集:第3卷[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16.
- [7] 朱荫贵. 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 [8] 《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 大生系统企业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204-208.
- [9] 南通市档案馆,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留学生部江南经济史研究室,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 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纺织编(I)[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10] 张謇. 张謇全集:第5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9.
- [11] 朱荫贵. 论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传统因素[J]. 贵州社会科学,2018(6):5-13.
- [1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荣家企业史料[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11.
- [13] 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8.

责任编辑:郑晓艳

(Email: zxyfly@126.com)